

# 八“异”与三“疑”： 关于红山文明与凌家滩文明关系的若干思考

任瑞波 涂令颖 张小雷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龙

距今5500年左右,分布在辽西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都进入到早期文明阶段,两支文化都发现了明确的祭坛和高等级墓葬,也共见部分形态非常相似的玉器。长期以来,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讨论的焦点。最近,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红山文化石家出土了与凌家滩文化发现的形态相似的玉冠形玉器,再次将学界的关注聚焦于此。

虽然相同玉器共见的现象较为明确,但学界对两支文化或两种文明的关系认识却不统一,有学者认为是红山文明影响了凌家滩文明,也有学者认为是凌家滩文化影响了红山文明,还有人认为二者之间关系不确定,孰是孰非至今尚未有定论。我们的意见是,讨论两支文化的关系,既要重视精美的玉器,也要关心典型的陶器。单纯器物之间的形态对比固然非常重要,但相关器物所在的“出土情境”也不可或缺。既要宏观去考虑,也要从微观视角去考察,既要客观看待二者的“同”,也要清晰辨析二者的“异”。当前,很多学者多关注两个文化或两支文明中玉器的共同之处,但是对二者的区别却较少有提及。从现有的材料看,这些区别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至少包括以下八处。

第一,两支文明所在的文化体系不同。凌家滩文明和红山文明分别脱胎于凌家滩文化和红山文化,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凌家滩文明脱胎于长江下游巢湖地区的凌家滩文化,她源自北阴阳营文化的可能性较大,但去向不明,与良渚文明究竟是否有关还未有定论,其所属的文化系统迄今不是非常清楚。红山文化是根植于东北辽西地区,属于小河西文化—南台子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小河沿文化的文化系统,文化发展脉络清晰,早晚演变关系明确。虽然红山文化从早到晚有西南方向黄河流域后岗一期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碰撞与融合,但其主根脉是从东北本地孕育而出的。

第二,出土玉器的遗址疏密程

度不同。凌家滩文化的玉器集中出土在凌家滩遗址,其他遗址和墓地很少见到,整体分布非常集中,出土地点较为单一。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地点较为广泛,遍布于整个辽西河流域,在内蒙古、辽宁和河北三地均能见到,如内蒙古敖汉旗元宝山遗址和在大沁他拉遗址、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和朝阳半拉山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和阳原姜家梁遗址,都能见到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玉器。

第三,出土玉器的遗址性质不同。凌家滩玉器绝大多数属于墓葬随葬品,个别出现在墓葬填土中或墓口,也发现个别祭祀性质的遗迹中有玉器。而红山文化玉器不仅在墓葬中可见,也在与墓葬关系密切的“坛”或“冢”的石构堆家中能够见到。不仅如此,内蒙古哈拉黑遗址和喀喇沁旗刘家梁遗址的发掘表明,红山文化遗址中也有典型的玉器出土。

第四,随葬玉器与陶器共存的情况不同。在凌家滩遗址前六次发现的70多座墓葬中,仅有7座墓葬不见玉器,1座墓葬只随葬玉器不见陶器,其余所有墓葬均是玉器和陶器共存,且这些陶器都是用以指示凌家滩文化的典型陶器——豆、罐、壶。《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的分期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玉器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在红山文化中,陶器和玉器共存情形与时间早晚密切相关,以牛河梁遗址为例,出现玉器和陶器共存的墓葬数量较少,年代相对较早,与玉器共存的陶器多为彩陶壶和陶盘,只随葬玉器的墓葬数量很多,年代较晚。

第五,玉器在单个墓葬中的出土数量不同。凌家滩遗址各墓葬随葬玉器数量的情况各不相同,前三次发掘的44座墓葬中,有近一半墓葬随葬的玉器超过10件,少则十几件,多则上百件。2007年发掘的M23随葬玉器数量足有200件,这是迄今凌家滩文化中出土玉器最多的墓葬。而红山文化墓葬中,绝大多数墓葬随葬玉器不超过10件,目前在牛河梁、东山嘴、元宝山等大型或超大型石家遗址发现的中心大墓中,单个墓葬随葬玉器超过30件的情况少之又少,如牛河梁第二地点1号家大墓M25随葬玉器7件,M26随葬玉器4件,M21随葬玉器20件。

第六,玉器的绝对年代存在明显差异。这里所说的年代,包括了玉器的制作年代、使用年代和延用年代。凌家滩文化的玉器年代至今没有明确,因为在目前公布的凌家滩文化测年标本中,少有直接来自随葬玉器的墓葬,多数学者认为距今5600~5200年是凌家滩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玉器较为可信的年代区间,有学者认为年代可能要更早,但缺乏足够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部分玉器有明确的使用痕迹,表明这些玉器不仅是随葬品,也是墓主或与之关系密切的人生前的使用品。根据以往的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的年代大多落在距今5500~5000年的范围内,但随着内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冠形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管状器



元宝山遗址随葬玉器出土现场

一种可能性成立,成功的出行至少应该包括三个环节:第一,要能从出发地准确、安全到达目的地;第二,要在目的地进行自由的活动和无障碍的交流;第三,要能从目的地准确、安全返回出发地。简而言之,既要能出得去,也要能回得来。虽然我们不应低估史前文化人群交流的愿望和迁徙的能力,但是在距今5500~5000年,少数人能够顺利完成千里之行的行程需要各种现实条件的保障,其难度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上述“八异”是考古实物材料能透露出的明确信息,可以根据考古实物材料进行深入讨论,但是“三疑”则是当下仅依靠考古学似乎暂时解决不了或难以说清楚的问题,这提醒我们,不能将一些推测性较多或猜测成分较大的认识视为“定论”,也应客观正视考古学的“局限性”,理性看待考古学研究过程中的诸多“不解之谜”,至少在考古学层面,一些问题不宜强行解释或过度解读,积极借助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相关知识似乎是顺势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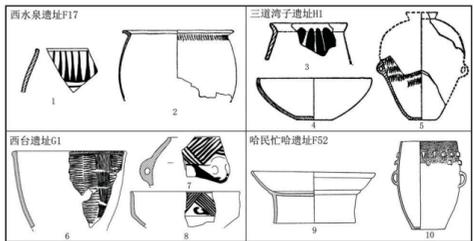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项目批准号:2022JZDZ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红山文化带钮陶缸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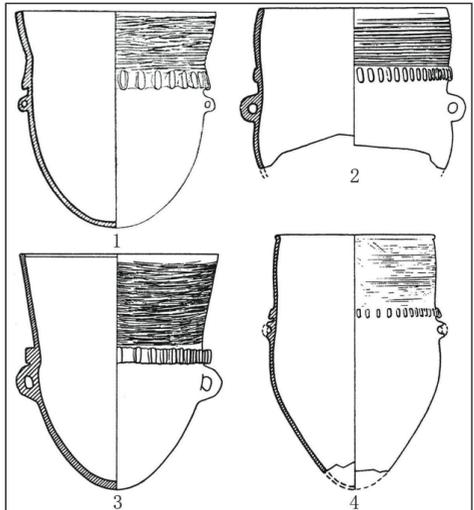
高云逸



图一 红山文化带钮陶缸及其共存器物



图二 其他遗址出土陶器



图三 后冈一期文化带钮陶缸

红山文化遗址中见有一种形制较为特殊的陶缸,这类陶缸基本均为泥质红陶,器身上部多装饰弦纹及交叉纹等刻划纹。最显著的特征是器体中部安一周密集排列的凸钮,凸钮形态多样,有棱锥、半圆柱及鸟喙状等。红山文化这类带钮陶缸以往偶见报道,并且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由于数量很少,因而始终无专文探讨。可喜的是,近来发表的赤峰市彩陶坡遗址发掘报告刊布了一批珍贵的带钮陶缸材料,为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试对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资料进行全面整理,重点分析其期别与年代,并就其渊源、影响与功用等问题略述己见,以期对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推进有所助益。

### 红山文化带钮陶缸的期别与年代

就目前已正式公布的材料而言,共有六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带钮陶缸,分别是朝阳市小东山遗址、牛河梁遗址,赤

峰市红山后遗址、彩陶坡遗址、四棱山遗址及南杨家营子遗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类陶器数量较少,且大都较为破碎,其阶段性特征尚不明朗。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文对其期别与年代的判断将主要从共存的其他陶器的时段性特点出发。

小东山遗址仅在G1内出土1件带钮陶缸腹部残片(图一,1),与之共出的1件彩陶罐(图一,2)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与赤峰西水泉遗址F17出土者相同(图二,1),二者年代应大体相当。西水泉遗址F17还发现了1件后冈一期文化典型的陶釜(图二,2),证明该房址处于距今6000年前,即红山文化早期阶段(距今6500~6000年),由此推知小东山遗址G1亦处于这一时期。此外,小东山遗址G1出土的石斧两侧边缘磨平(图一,3),带有显著的赵宝沟文化遗风,同样证明该单位年代较早。

彩陶坡遗址发掘报告公布了F10、F2和H1三个单位出土的带钮陶缸标本,均无完整器。F10是目前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此类器物数量最多的单

位(代表性标本参见图一,4~7)。F10出土折腹彩陶钵和敛口彩陶罐(图一,8、9)的型制及纹样与赤峰西台遗址G1出土同类陶器(图二,9、8)相仿,年代当相去不远。西台遗址G1属红山文化中期典型单位,彩陶坡遗址F10的期别便不言自明。

F2出土3件陶缸(图一,10~12),共生的黑彩垂瓣纹、敛口钵及壶与赤峰市三道湾子遗址H1出土者(图二,3~5)极为接近,当为共时性的体现。张星德教授的研究表明,三道湾子遗址H1处于红山文化中期阶段,彩陶坡遗址F2亦处于这一时期。

H1出土1件陶缸腹部残片(图一,16),伴出的筒形罐唇部加厚,并施斜向按压纹,器表饰密集的横竖压排之字纹(图一,17),整体风格与前述西台遗址G1出土筒形罐(图二,6)别无二致。借助于类型学横联法,可知彩陶坡遗址H1与前述F10共时。基于以上所做的类型学分析可知,彩陶坡遗址F10、F2和H1均属红山文化中期单位。F2和F10出土炭样的测年结果经树轮校正均为距今5800年,恰处于红山文化中期(距今6000~5500年)年代范围之内。

牛河梁遗址N222封土中及N24B垫土中各出土1件带钮陶缸腹部残片(图一,18、20),二者与牛河梁遗址“下层积石家阶段”流行的A型筒形器(图一,19、21)共出。赵宾福教授的研究显示,牛河梁遗址的“下层积石家阶段”诸单位处于红山文化中期,因之牛河梁遗址这两件带钮陶缸也属于红山文化中期遗物。

南杨家营子遗址带钮陶缸(图一,22)系采集所得,红山后遗址及四棱山遗址带钮陶缸(图一,23)无共存陶器,二者在红山文化分期框架中的位置暂不明晰。

### 红山文化带钮陶缸的渊源与影响

红山文化的泥质红陶带钮陶缸并非辽西地区的本土因素,而是由黄河流域传入的,对此学界基本没有异议。在黄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中,与红山文化早期年代一致并且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分布于华北平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后冈一期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有带钮陶缸,并且其与红山文化的共性特征一目了然。例如,安阳市后冈遗址及邯郸市石北口遗址带钮陶缸均为圆底,上半部饰刻划弦纹,中部置凸钮,下半部素面,基本均为圆底(图三),这些特点在红山文化带钮陶缸上均有体现,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后冈一期文化的重要前身北福地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就已经出现了带钮陶缸,说明这类陶器是这一谱系考古学文化渊源甚早、一脉相承的文化元素。辽西地区则找不到年代早于红山文化早期的带钮陶缸,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是由南邻的后冈一期文化输入的。

至红山文化中期阶段,带钮陶缸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此时繁盛一时的后冈一期文化已经终结了。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虽然脱胎于后冈一期文化,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其母体的特点。诚如彩陶坡遗址发掘者所注意到的,红山文化带钮陶缸唇部加厚且不见器耳,这是异于后冈一期文化的特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彩陶坡遗址出土带钮陶缸之上除后冈一期文化流人的刻划纹外,还有压印之字纹(图一,6)这种红山文化的标识性因素,生动地展现出两

种文化传统逐步走向融合的场景。

在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和哈民文化发现有带钮陶缸。哈民文化中也有通辽市哈民哈遗址F52中出土1例(图二,10),F52出土的高圈足盘(图二,9)是红山文化晚期出现并迅速流行的器类,一方面说明该房址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另一方面也说明哈民文化深受红山文化的影响。同理,哈民文化这件陶缸之上的鸟喙形凸钮也有可能源自红山文化,这或许暗示着红山文化晚期存在尚未被我们发现的带钮陶缸。当然,哈民文化对于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并非原样照搬,而是在借鉴的同时积极融入了自身的特色,其上部极具辨识度的麻点纹即是明证。

### 红山文化带钮陶缸的功用

对于我国史前时期发现的这类器身带一周凸钮陶器的功用,最具影响力的解释就是陶鼓。这些凸钮被认为是固定皮革鼓面的钉。由于文献及民族学材料中均可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因而这种解说也是比较令人信服的。那么,是否考古发现的所有史前时期带钮陶器都是陶鼓?对此显然不能一概而论。

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均为器壁较薄的泥质陶,红山文化泥质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质地较为疏松,其硬度远低于同时期黄河流域庙底沟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泥质陶。因此无论是鼓槌敲击还是手掌拍击,都极易造成此类制作难度较大的陶器的破损。此外,从红山文化唯一可复原的四棱山遗址出土带钮陶缸来看,其圈底的特征似乎也难以与陶鼓相联系。总之,红山文化的此类陶器很可能与陶鼓无关。

令人欣喜的是,刘莉教授团队近年来对于黄河流域同类陶器的科技考古研究,为我们思考红山文化带钮陶缸的功用提供了全新的启发。团队对庙底沟文化灵宝市西坡墓地出土圈底缸进行了淀粉粒、植硅体和真菌的残留物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陶器曾被用来酿酒和盛酒。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刘莉还对秦寨文化傅师市灰嘴遗址出土带钮尖底缸内壁残留物开展了微化石分析,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其为酿酒器。她明确指出,圆锥体的底部“有助于酿酒醪液中固体部分(酒糟)的沉淀,并有利于液体部分与固体部分的分离。”这些新颖的实践与结论为相关问题的研究开阔了思路,也提供了新的力证。

由这些研究案例推断,红山文化的带钮陶缸很有可能也是一种酿酒器具,其器表的一周凸钮应是用来固定皮革一类封口物质,利于营造缸内的密闭环境,从而便于酿酒材料的发酵,其圈底的结构特征也有助于酒糟的沉淀。在此我们呼吁今后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陶缸内残留物进行检测分析,以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来揭示这类器物的功用之谜。若能确认这类陶器就是酿酒器,则不但能够进一步复原红山文化先民的日常生活,还可为其时仪式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切入点。张光直先生很早就认识到,酒是中国古代巫师通天地时所用的重要工具。众所周知,红山文化的宗教活动十分兴盛,沟通天地人神应是当时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酒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然而有关红山文化酒的研究至今尚未起步,带钮陶缸可作为今后这类课题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